

严复的性格变迁〔*〕

——兼论其对仕途的影响

○ 黄令坦¹, 郑大华²

(1.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, 湖南 长沙 410082;

2.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, 北京 100006)

〔摘要〕依据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的“自卑与超越”原理, 少年丧父, 家道中落, 是严复早期养成桀骜不驯性格的重要因素。严复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仕途上的成功。但是由于性格使然, 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政者, 对他的仕途造成很大的障碍。所以他在“北洋当差”时期, 一直未能得到上司李鸿章的重用, 这让严复十分心灰意冷, 甚至有退隐到诗酒田园的打算。中年之后, 严复总结自己早年仕途多荆棘的根本原因是年少时的率意行径, 并对此深为懊悔并试图做出改变。转变性格的严复, 似乎已经不再嫌弃和讨厌官场的潜规则, 甚至摸索出了为官之道。因此, 清末立宪时期严复的仕途颇有起色, 到袁世凯当国时期, 他的政治生涯进入了巅峰时代。

〔关键词〕严复; 性格与仕途; 李鸿章; 袁世凯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18.03.017

严复, “于中学西学皆一流人物”, 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, 但同时也是位大器晚成的思想家, 其成长过程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。以往学界多关注其思想的成长和变化, 而忽略了他性格的成长和变化。性格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, 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, 并表现在他的行为举止中。时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, 乃至决定一生的成败, 足见性格对人生成长的决定作用。因此, 知人论世是研究历史人物必不可少的工作。本文试图对严复的

作者简介: 黄令坦,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,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,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; 郑大华,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,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, 博士生导师。

〔*〕本文系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“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”(项目号: 13@ZH018); 2013 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”的阶段性成果。

性格做些研讨,同时讨论其对人生仕途的影响,以供同行商榷。

一、少年楚狂人

严复性格自少年起,就表现为恃才自负,桀骜不驯,言辞激烈,好逞口舌之快。他在留学期间,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,十分激赏其才华,在日记中称赞他“于西学已有窥寻,文笔亦跌宕,其才气横出一世,无可其意者”^[1]。与严复交往甚密的郑孝胥也在日记中记载到:“观又陵文,天资绝高”。^[2]亲朋好友在叹服严复才华的同时,也提出了对他性格的担忧。郭嵩焘委婉地评价他“气性太涉狂甚”,并有“负气太盛者,其终必无成,即古人亦皆然也”的忧虑。^[3]继郭嵩焘之后的驻英公使曾纪泽评价:“宗光才质甚美,颖悟好学,论事有识……而自负颇甚”,认为郭嵩焘的“褒奖太过”,造成他的“狂傲矜张之气”。^[4]郭嵩焘则辩解道“又陵之狂,由来固已久也”。^[5]

人的性格的形成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,且后天因素是主要的。严复早年的遭遇是他这种性格养成的重大诱因。严复的早年是十分悲苦的,十四丧父,父死家贫,中断学业,全家也搬到了阳崎乡下居住,乡下的老屋“上见星而下见土”。而且老屋的一半抵押未赎回,为他人居住。这在少年敏感的心灵中,深埋下孤苦和死亡的阴影,时时刻刻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,因此严复兄弟“皆悲不自胜”。^[6]1866年,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招生,除提供食宿外,每月发银四两,补贴家用。因受生活所迫,严复准备前往报考。考生除具备一定条件外,还需要找个绅商出具保结。同乡举人严厚甫恰是严复的胞叔,严复母子便去求他。不料这个举人怕惹事,竟无情予以拒绝。幸亏族中有个前辈给他们母子献计,说厚甫是你胞叔,三代直系,祖宗相同,可瞒着他将三代名讳职业和他本人功名经历照填保结,加上他一个私印呈送上去。如果对保查询,他也不好当众否认。母子就按这个办法做了。不料此事终被这个举人发觉,破口大骂,扬言要具禀退保。母子为此痛哭跪求,才告以平息。^[7]

严复最终不仅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福州船政学堂录取,而且特别珍惜进学堂的机会,格外地勤奋刻苦,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这或多或少会给一个奋发向上的心灵带来一些充实感和成就感。

一直到中年,严复回顾自己的出身时坦率地说:“少日贱子贱,身世随所遭。与官充水手,自审非其脚。”^[8]晚年在回顾自己悲苦的人生经历时曾坦率地以诗抒情:“慈母于此时,十指作耕耒。上掩先人骸,下养儿女大。富贵生死间,饱阅亲知态。门户支已难,往往遭无赖。五更寡妇哭,闻者堕心肺。”^[9]个体心理学家认为“当人们面对他无法应付的问题时,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。因此,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,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。”^[10]早年“父死家贫”的困境,很容易给严复留下自卑心理的阴影。严复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自己“天生贫骨”,^[11]这无疑是在无意间流露出的自卑感。

“智力低下的人不感到自卑，他们在客观上能力差，在主观上并不为之苦恼。因此，全然没有自卑感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卓越的人。”^[12]不可否认，严复的才智在当时是绝对卓越的，甚至一直到死，严复都认为“吾受生严氏，天秉至高”^[13]。“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，他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，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。”^[14]正是这种深刻自卑的强烈刺激、压迫，造成了严复心理上难以忍受的紧张和焦虑，使他潜意识产生了同样强烈的超越这种自卑感的欲望，要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，以此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，减轻心理上的不适应。这种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表现在严复身上，就是通过批评别人来展示自己的才华，以显示自己在才智上优越于别人，来填补内心的自卑。

还在英国留学期间，严复就自恃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人能及，攻击驻英公使曾纪泽“门第意气太重，天分亦不高”，对中西时事的见解“去事理甚远”。当然，作为留学生监督的曾纪泽，对严复也怀有恶感，斥责他“狂傲矜张”。^[15]回国之后，严复的这种狂傲的性格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更甚，大有猛龙过江之势，他“极喜议论时事，酒酣耳热，一座尽倾，快意当前不能自制，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，以标风概，闻者吐舌，名亦随之”^[16]。

在他讥评的“有气力”的人当中，千不该万不该，竟然把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也囊括进去。日本占领琉球之后，严复无比愤慨，对人说“不三十年，藩属且尽，瓯我如老悖牛耳！”^[17]不仅如此，他更进一步批评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沈葆楨、李鸿章等中兴名臣，办洋务几十年，竟然没有给海陆军培养一个真正的人才。^[18]当时北洋水师内部本就龃龉，严复这样的言辞自然而然会传到李鸿章的耳朵里。中法战后，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全权大臣，与法国签订《中法新约》，此约受到朝野上下的非议，言官弹劾李鸿章，李鸿章遂疑忌严复参与了非议他的活动。严复得知后，十分的愤慨，或许是因为冤枉他了。^[19]但是，如果不是因为严复老是在背后批评李鸿章，李鸿章对此有所耳闻，又怎么会怀疑到严复的头上呢。

除了直言不讳、好逞口舌之快，严复的性格中还有自负清高，不肯屈居人下的一面。李鸿章曾经示意他执称弟子，他却对此不屑一顾。^[20]庚子以后，袁世凯在政治上春风得意、炙手可热之时，曾经多次邀请严复做幕宾，而严复“萧然自远”，不肯俯就，并且有意与袁保持距离。^[21]

抛开时局的因素不管，狂傲如果仅仅在文化的领地里横行，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才气；要是跨进了政治的界线，那就极少有好结果了，偏偏严复正是一位热衷于仕途的文人。从1885年至1894年，他四次参加乡试，均名落孙山。第四次回福建参加乡试落第后，作《太夷继作有“被刖”诸语见斩，乃为复之》描述当时参加科举的心情，其中有“无何八股亡，大耻末由濯……内实抒宿愤，外示昌新学”之句，自我解嘲。^[22]愤恨之余，历数八股的危害：锢智慧、坏心术、兹游手。可是等到1898年光绪帝为变法开“特科”，召集人才，严复并没有听吴汝纶的劝阻，再次参加科考。随着变法失败，特科作废，至此严复希望通过科考功名步入仕途的梦想便化为泡影。严复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强烈欲望，是由内心深刻的自

卑压迫出来的,在他看来自己“当年误习旁行书,举世相视如髦蚩”,^[23]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证明自己的才华,使人们淡化、忘记他“武学生”的出身,但这种强烈的愿望最终没有得到满足,所以我们就并不难理解严复为何如此深恶痛绝科举考试。

关于晚清官场奉行的原则和官运亨通的诀窍,前有曹振鏞的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,后有曾国藩的“打破牙和血吞”。这虽是晚清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,但也同时说明了,如果想在这个官僚体制内谋求发展,就不得不适应并遵守这个丛林法则。一旦违背这个法则,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,仕途受阻,乃至被淘汰。

甲午战争爆发时,严复留学期间的同学,甚至他教授的学生,就有数人授、署二、三品实缺,^[24]而严复还是水师学堂的总教习,不免有“四十不官拥皋比,男儿怀抱谁人知”之慨。^[25]好友郑孝胥赠与严复的诗中有“慷慨怀大志,平生行志哀”之句,抒发了严复心声,严复得到后大悦。^[26]

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到戊戌变法失败,是严复思想喷发的时期,也是严复的性格得到最大张扬的时期。甲午战争给严复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别人无法理解的,随着中国战败而灰飞烟灭的北洋将士,不是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、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,就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教授的学生。二三十年的同学故旧,在一夜之间天人相隔,对于严复不啻为当头棒喝,怎能不让他愤怒、悲凉、哀嚎。严复悲痛万分,“尝中夜起而大哭”。^[27]

在甲午战争之前,严复担心影响仕途,对李鸿章还有所顾忌,还只是在私底下批评李鸿章,并没有直接、公开抨击李鸿章。但甲午战争之时,严复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绪。在给陈宝琛的信中,对于清军屡次失利的原因,严复认为是李鸿章“昏庸骄蹇,丧心误国”导致“推求厥咎,大半皆坐失先著,绸缪之不讲,调度之乖分,合肥(指李鸿章)真不能辞其责也”^[28]。对于李鸿章的外交方针,严复痛斥“‘和’字一言,其贻误天下,可谓罄竹难书矣!”对李鸿章用人行政,他也给予严厉批评:“合肥用人实致愤事,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,则起衅之由也;信其〔壻〕张蕙斋□浸润招权,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,欲同邑之专功,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;任其甥张士珩,所以致军火短给,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。以己一生勋业,徇此四五公者,而使国家亦从以殆,呜乎,岂不过哉!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,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。”^[29]

从1895年初开始,他大声疾呼地在天津《直报》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政论《论世变之亟待》《原强》《辟韩》《原强续篇》《救亡决论》。通过多方位的中西对照,对中国的文教、政治、道德、风俗进行全面的批判。其中公开发表的《辟韩》一文,主要是勇敢地站出来批判李鸿章。李鸿章对韩愈是何等倾服,甚至以当代韩愈自诩,是朝野尽知的事。^[30]严复实际上是借《辟韩》,辟李鸿章的文化道统。^[31]虽然严复如此激烈地公开批评李鸿章,但也不是毫无顾忌。当李鸿章再次复出,奉命出使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时,严复开始担忧自己的职位,他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写到:“此间事势旦夕变更,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,年底定必回京,飭回北洋,十有

八九,那时,兄是否仍当此差,尚未可定也。”^[32]

戊戌变法期间,严复与王修植、夏曾佑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。《国闻报》不仅登载国内外时事,并经常发表社论,宣传变法维新,是北方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。严复作为国闻报的主要负责人,在此期间共发表 27 篇社论。^[33] 这些社论无一不是针砭时弊一针见血,特别是关于对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的一系列社论,直接揭露和抨击当事者对入侵之敌奴颜婢膝的无耻行径。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,嫉妒他的人说他“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也”。^[34] 甚至还发生了御史李盛铎弹劾严复及《国闻报》,诬陷他与外国人勾结。幸好,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庇护下,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戊戌政变后,时人钳口结舌,没有敢议论时政的,而严复依旧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,谈论纵横,毫无顾忌。以至于当时日本《万朝报》主笔内藤虎次郎认为他是“当地第一流的人物”。^[35]

然而在此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,在他写给张元济的信中,严复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变得十分谨小慎微。信中他谈到,《国闻报》上刊登《杭州驻防瓜儿佳氏上太后书》,有杀荣禄以谢天下的词句后,认为“《国闻报》将此种文字刊列,实属造孽,可怕,可怕!弟年来绝口不谈国事,至于书札,尤所谨慎。今与吾兄遂有忍俊不禁之意,望阅毕即以付丙,不必更示他人,使祸根永绝”。^[36] 这时严复应该意识到谈论国事,将会给自己招来祸患,或者有大祸降临的预感,所以才收敛自己好发清议的性格。

庚子年间,严复进一步受到打击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期间,毁坏了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水师学堂,学生作鸟兽散。严复也由天津赴上海避难,途中八岁的次子严隲染病,在极度恐慌的时候,严复时而喃喃念佛,时而向菩萨大许其愿,时而又祈祷上帝保佑。最终疾病还是夺走了严隲的生命,严复恸哭不已。^[37] 到上海后连生活费都没有,无奈向妹夫何心川借了一百元。然而,破屋偏逢连夜雨,严复的厄运并未到此为止。在上海时,他对政治的热情依旧没有消减,积极活动,由于不知道唐才常自立军的机密,遂参加唐才常召开的“中国国会”,并被选为副会长。不到二十余日,因起义消息走漏,唐才常在汉口被捕牺牲,参与“国会”的首要成员被清政府通缉,严复遂躲进租界避祸。本想在体制内谋出路的严复,这时一下子成为清政府的通缉犯,这个打击对他来说不算小。

虽然严复在这场事件中最终免于牢狱之灾,但自此之后严复对自己的官场前途逐渐不抱任何希望。1901年,在写给曹典球的信中,描述了庚子事变后的消极态度。“常嘿嘿廉贞,舍闭户译书而外,不敢有妄发者,坐此故也”。^[38] 1905年左右,严复已经对自己的仕途几乎不抱任何期望,并对自身从新进行了定位。在他写给好友的信中多次提到“人生入世后,行止不由自主,往往如是……即少留终当去也”,^[39] 而自己又是“天生贫骨,万分不能事人”,自己已经是“心灰意懒之夫,诚不欲返伯鸾之灶也”^[40]。所以打算辞去开平煤矿和译书局的公职。然而一家十几口,寄居他乡,儿女五六人还需要教养,“此皆非巨款不办,真不知如何挪展耳。若自为所能为作想,只有开报、译书、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”。^[41]

“若更有盈余，则拟往外洋游历，大略告假作闲人而已，不复受人羁束矣”。^[42]

二、中年反思

在英留学期间郭嵩焘对严复就有“负气太盛者，其终必无成，即古人亦皆然也”的忧虑。^[43]没想到却一语成谶，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后，严复“自叹身游宦海，不能与人竞进热场，乃为冷淡生活”。^[44]1904年初，严复辞去所有的公职，在与亲朋故旧一一道别后，携眷离开了他供职了二十五年的北洋，来到上海，远离名利场，准备享受“江湖之乐”。严复也认为自己是“徒以中年攸忽，一误再误”。^[45]然而对“一误再误”的原因分析时，严复有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。

早年严复对自己仕途不畅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官场黑暗、豺狼当道。1896年，他在给堂弟观澜信中倾吐自己的忿忿不平：“眼前世界如此。外间几无一事可做，官场风气日下，鬼蜮如林，苟能拂衣归里，息影敝庐，真清福也。兄自来津以后，诸事虽无不佳，亦无甚好，公事一切，仍是有人掣肘，不得自在施行。至于上司，当今做官，须得内有门马，外有交游，又须钱钞应酬，广通声气。兄则三者无一焉，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？置之不足道也。”^[46]1899年，严复欲在总理衙门谋一个差事，赴京活动，在他写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，提出了自己的担忧，“第念生平进取之机，往往将成辄毁；今者此事，外无督抚之一保，内则译署之无人……况声利之场，皆有捷足尖头之辈，复弩钝后时，庸讷必得，则亦听之天命而已，无容患得患失于其间也。”显然，在这封信中，严复将自己在仕途上的屡次失利归因于自己不善于趋炎附势、投机钻营。

中年以后的严复，在分析自己仕途不顺的原因时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多归咎于客观外在环境，而是反求诸己，从自身的性格着手。到了1905年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严复，对此有另一番悔悟和反省，在家信中谆谆教诲已是而立之年的长子严璩“吾儿方及壮年，家贫亲老，此后职宜与世为缘，岂宜更蹈汝父覆辙，邀其谤毁？故愿吾儿一听父言，必变此计。吾非望汝媚世阿俗，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忤俗。吾前者即缘率意径行，于世途之中不知种下多少荆棘，至今一举足辄形挂碍，顷者自回国以后，又三四次睹其效果，深悔前此所为之非”。^[47]由此可见，严复自己总结早年“世途”多荆棘的根本原因是年少时的“率意行径”，并对此深为懊悔。作为当事人的严复，对自己早年仕途坎坷的反思应当是最深刻、最根本的。虽然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恨，但他并不赞成走向另一个极端：阿谀奉承、巴结逢迎。所以在信中同时又嘱咐儿子：“亦不必向人乞怜，但不可更为高亢足矣。”^[48]

到上海后，严复一度随张翼赴伦敦处理开平煤矿权利纠纷案，但随着他对此案的了解越深，慢慢发现张翼并未以实相告，遂有被蒙骗的感觉，便不再参与此案。回到上海后，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，并一度担任校长。1906年9月，应安徽巡抚恩铭的邀请，担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。1907年7月，恩铭被光复会员徐锡麟刺杀，严复自此也离开了安徽高等学堂。

9月,严复应学报之召离沪北上,以同考官考试留学毕业生。这时候,清政府已经下达了“预备仿行立宪”的谕旨,但是学部之召并未让严复感觉到任何欣喜。到京后“无日不是应酬,脑满肠肥,极为讨厌”。留学毕业生考试结束后,学部欲挽留他,但他“心中颇不高兴”。在他看来,清政府的立宪“大抵黑暗糊涂,不大异三年前,立宪变法,做面子骗人而已”。严复对仕途的期望仍是十分消极的,所以在他与夫人的信中便直截了当地说:“吾看今时做官,真是心灰意懒也”。^[49]10月末,严复又回到了上海,继续任复旦公学监督,从事教育事业。

1907年左右,无论从行径还是言辞上考察,严复这时候已经极为厌倦官场上的蝇营狗苟的风气,并且对自己的仕途基本上不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,并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从新定位了自己以后从事的事业。他对自己早年仕途不顺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,不再像早年那样怨愤官场的黑暗,导致自己怀才不遇。而是反求诸己,反思自己早年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是否符合人情世故和官场规则。

虽然自从1904年之后,严复辞去所有的公职,并决定不再步入官场这是非之地,但是这并不代表从此不再关心政治,恰恰相反,他对政治的关注度不但没有减弱,反而是强烈地关注,只不过是论政而不参政而已。一直到1907年,作为政局的旁观者,严复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的文章和演说。1905年中国人掀起抵制美货运动后,严复在报端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,并与于右任等展开激烈的论战,先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五篇政论性的文章,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建议。^[50]日俄战争后,严复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《原败》,探讨俄国失利的原因及对清政府的启示。1906年是严复极为关心政治的一年,这年他一口气公开发表了十六篇政论性的文章和演说词。^[51]数量上已超过甲午年间,范围之广,涉及到教育、币制、外交等诸多问题。这年,严复还请郑孝胥写了一副对联,挂在书房之中,联曰:“有王者兴,必来取法。虽圣人起,不易吾言”,充分反映出严复企图指点江山的渴望。凡此总总,都表明严复虽然淡出官场,但他对政治的关注依旧热忱。

然而到了1908年,严复的仕途出现了转机,他对自己出仕又重新燃起了信心。1908年3月,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欲召严复为新政顾问官,严复似乎比较中意于每月300元薪水及200元的车马费,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严复准备应召北上,但是由于复旦公学的学生群起挽留,他又进退维谷。一直到8月末,严复才北上天津应杨士骧的聘请。再次来到北洋,严复心中有另一番滋味,在他写给夫人的信中:“杨莲甫意思甚好,但吾系卅年老天津,今日见一班人如蔡述堂、周长龄等市井小儿,皆是方面监司,作大老官面目向人,未免令人感慨耳。”^[52]一方面严复和蔡述堂等人对比嫌委派的官职过小,另一方面感慨的是自己的仕途“一误再误”,三十年没有长进。

再次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,严复的那种好高谈阔论的性格,一旦环境允许,就再次释放出来。在直隶提学使的欢迎宴会上,座中只有严复与英敛之大发议论。^[53]被杨士骧聘为新政顾问官不久,在给甥女何纫兰的信中,开头严复便洋洋得意地写到:“昨为杨帅做得一篇请兴办海军摺稿六七千言,大家佩服无地。我

现在真如小叫天，随便乱嚷数声，人都喝彩，真好笑也。”^[54]

此时严复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桀骜不驯，不肯屈尊他人。根据严复日记以及致夫人朱明丽的信中，不难看出这时的严复不仅比较注重与权势者的私交，而且为了“私人目的”，频频拜访王公大臣。1909年5月，任宪政编查馆咨议官后，严复除了拜谒本部堂官外，其他“如庆王、张、鹿两中堂，他如泽公、肃王，皆经见过，诸阔老意思都好，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”。^[55]在此前后，还多次拜访直隶总督杨士骧、陈夔龙，两江总督端方、张人俊等。^[56]

此时严复对自己的仕途，又重新有了信心和希望。他自中年以来就身受咳嗽诸病的折磨，担心自己的病“成送老之物，但若长此不瘥，北方殆难久住，因此一切进取之意都灰懒了”^[57]。因此，多次嘱咐夫人熬制药膏速寄给他。在此期间，为了获得游美学务公所副职，他多次致书那桐、毓郎等。^[58]经过一番的活动联络，严复不仅成为岑春煊等人的座上宾^[59]，并且在仕途上颇有一番起色，朝廷赏给一等文科进士，并获得了宪政编查馆咨议官、审定名词馆总纂、度支部清理财政处咨议官、钦定资政院议员、海军部协都统等一系列颇有名望的官衔。

从1908年到辛亥革命，严复几乎未公开发表过自己的政治观点，没有任何政论性的文章见诸报端，几乎从论坛上消失。这其间的缘由，严复并未给出直接的解释，但历史学并不排斥合理的推理，严复在此期间，颇有“进取之意”，奔走应酬结交达官贵人，最终谋得数个兼职，公务繁忙，势必占用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。

此时严复也已改青春年少时的“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”的性格，一方面积极与政界大佬结交联络，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积极地为这些大佬说话。袁世凯被罢官期间，墙倒众人推，诋毁和抨击袁世凯的人风起云涌，严复却“抗言非之”^[60]并不胜惋惜，哀叹“此人国之栋梁，奈何置之闲散”。^[61]要知道，在三四年前，严复在与熊季廉的书信中，对袁还是恶语相向，“此几外沽有为之名，内怀顽固之实。死权躁进，茫不自知。不出三年必败。彼与庆邸虽有因循卤莽、麻木狂躁之殊，其实皆满清送葬人才也。”^[62]这突如其来的惋惜，与三年前相比大相径庭，非常值得玩味。袁世凯面对鼓破万人捶的境地，听到严复的话，自然是感激不尽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袁世凯再次复出，并受命组阁，严复随即拜访了袁世凯，并被任命为北方代表团代表，参加南北谈判。

资政院开院后，严复的政治态度几乎向朝廷一边倒。例如资政院讨论广西巡抚侵夺省咨议局权限，认为巡抚负有“违背法律，侵夺权限”的责任，资政院遂决定派出审查员审查此案。而严复在会上则为巡抚辩护，当即被其他议员所驳斥。后来又有三四次议案表态的时候，严复都是站在政府这边，引起其他议员很大的不满，甚至视严复为“政府党”的头目。^[63]严复为什么如此袒护清政府，这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。在资政院的二百名议员中，其中一半是钦定的。朝廷肯定会选派自己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参政议政。严复既然能被钦定为议员，那么在此之前的表现，在朝廷看来政治上是十分可靠的，是值得信任和依赖的。

三、晚年的醒悟和矜持

武昌起义后,严复已过知天命之年,对自己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反省。他对自己早年的心高气傲、直言不讳、放言高论的性格,“年老回思,则真无益,岂徒无益,且多乖违”。在他与自己门生侯毅的一封信中对如何为人处世,对他进行了谆谆教诲。严复规劝他不要效仿“伯夷之清”,因为“太自苦难行”。在与他人交往上“旦夕之忧不可以傲,至于穷困,势又不能不出于求人”。公开在报端发表自己的言论时,千万不可以持“鸣必惊人”的态度,这样会“积小衅而蕴大孽,授人以讫”,况且自己的“殷鉴不远,可勿自惩罚”。同时严复还劝他“不能与政界断绝因缘”,因为他现在“为生事所困”。^[64]在写给四子严璿的信中,规劝“校中师友,均应和敬接待,人前以多见闻默识而少发议论为佳;至臧否人物,尤宜谨慎也”^[65]。

辛亥革命后,严复因与大总统袁世凯有故,频繁拜会袁世凯,此时严复的性格和庚子事变之后简直判若两人。在庚子事变后的数年间,袁世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,曾经数次邀请严复,而严复不为所动,竟然“萧然自远”。^[66]袁世凯做大总统后,严复频繁地到总统府拜会袁世凯,例如清帝宣布退位后不久,严复便去拜会袁世凯,随即被排入袁世凯就职前的“临时筹备处办事”,^[67]并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,这是他从未得到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,严复得意洋洋地在家信中写到:“此确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,今不知何物矣。”^[68]

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后,严复的政治生涯也随之进入了黄金时代。他不仅是总统府的座上客,经常出入总统府,而且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、约法会议议员、参议院参政等数职。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殊荣,这其中定然与严复后来注重“与世结缘”的性格密切相关。此时,严复对袁世凯也多有吹捧,在他与熊纯如的书信中多次提到类似“今大总统雄姿盖世,国人殆无其俦”,^[69]“愿大总统福寿康宁,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。”^[70]

严复虽极力地赞美袁世凯,但并不代表他认为袁世凯是完美无缺无可指责的,实际上严复对袁世凯还是有诸多的不满,“然极其能事,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!欲与列强相抗衡,则太乏科哲知识,太无世界眼光,又过欲人从己,不欲以己从人,其用人行政,使人不满意处甚多。”^[71]特别是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,从实践上,严复深知或者预感到帝制复辟难以成功,^[72]“然其事又极危险,使此失败,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”。^[73]因此,杨度登门再三邀他发起筹安会,他始终不肯答应,没想到杨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竟然把他的名字列入“筹安六君子”之列,并发表于报端。在见到自己的名字被盗用后,严复既没有登报声明盗名,或者积极反对,而是采取了“即不拥护,也不反对”的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。此时严复的性格早已经和他年轻时大相径庭,要知道在他年少气盛的时候,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,酒酣耳热,快意当前,无法自制,尤其喜欢讥讽当权者,听到者都张目结舌。而到年老时,杨度借他的名字欺世盗名,意图变更国体,严复的

反应却是那么的软绵绵。这其中的原因，一方面袁世凯待严复确实不薄；另一方面，严复此时的性格已经不再是锋芒毕露，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激进，已经变得老成持重，是比较注重“与世结缘”，所以极不情愿地对复辟力量妥协。

老年做事比较讲究融通的严复，并未丢失自己的人格和底线。根据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理论：幸福作为人所追求的目的，它并不限定实现它而采取何种手段，是否道德，人们行为并不遵循意志的道德意向，而是遵循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，并依靠于利用这种知识，求达自己的幸福，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，人为了生存而活下去，只能以牺牲道德为代价。^[74]当然，严复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仕宦利禄，而没有道德底线。当袁世凯命内史夏寿田拿了一张四万元的支票，请严复写文章批驳梁启超，严复拒绝接受重金，明确拒绝撰文。甚至还抱“身可杀，头可断，此事断不能为”的决心。^[75]袁“知其意不可夺，驳梁氏之文，乃改命孙毓筠为之”^[76]。筹安会发起的六人中，其余五人都有“美新之作，劝进之文”，严复最以文学著称，而“终洪宪之世，独未尝有只字称扬帝制”同时，“筹安开会，以至请愿，继续劝进庆贺”，严复“未尝一与其中”。^[77]

随着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，严复受到通缉，也意味着他仕途生命的终结，从此便淡出了政界。综览他一生，其仕途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从1880年至1905年，这是“北洋当差”时期，仕途蹉跎，“味同嚼蜡”，^[78]不免时常会有北门之叹，几乎堕落成“心灰意懒之夫”^[79]；第二阶段，从1906年至1911年，即“预备立宪”时期，由于此前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等西方著作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，爆得大名，清政府也亟需宪政人才，这时期严复的仕途颇有起色，“海军部立，特授协都统，寻赐文科进士，充学部名词馆总纂。以硕学通儒政为资政院议员。三年，授海军一等参谋官。”^[80]第三个阶段，从1912年至1916年，即“袁氏当国”时期，此时的严复龙飞凤翔扶摇直上，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代。袁世凯秉政以来，先后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办、总统府高等顾问、约法会议议员、参议院参政。常常出入总统府，俨然袁的座上宾。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灰飞烟灭，严复的仕途也走到了尽头，画上了句号。

从政界淡出的严复，并不是从此身归诗酒田园，不再关心政治，他对中国的命运时刻予以关注，并且忧心忡忡。袁世凯去世不久，英国公使朱尔典回国，严复赴英使馆相送，“与为半日晤谈，抚今感昔，不觉老泪如绠。”朱尔典见状安慰道：“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，不至归于无效，天之待国犹人，眼前颠沛流离，即复甚苦，然放开眼孔看去，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，君其勿悲。”听了此番宽慰之话，严复才“稍为破涕也”^[81]。此后，严复一直关注着世界大势以及国内政局，在与友人的书中，他多次讨论一战期间中国应采取的对策，并对国内的“府院之争”“张勋复辟”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仍然念念不忘叮嘱国人，“须知中国不灭，旧法可损益，必不可叛。”^[82]

袁世凯死后，面对“一蟹不如一蟹”的中国政界，严复政治思想日趋保守的同时，对宗教鬼神的信仰变得更为强烈。在他的日记中，经常有关于易经占卜来算

命的记录。他不但动用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,募捐修建“阳崎尚书庙”,而且还亲笔为该庙写了几副对联。这些都反映了,他的人生观已经变得比较消极,性格也已经日趋缓和。

注释:

- [1][3][5][15][43]《郭嵩焘日记》第三卷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1年,第907、570、912、912、570页。
- [2][26]《郑孝胥日记》第一册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60、61页。
- [4]《为周养庵(肇祥)题篝灯纺织图》,《严复全集》第八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14年,第40页。
- [6]严复:《四弟观澜六十寿序》,《严复全集》第七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14年,第480页。
- [7][37]严家理:《严复先生及其家庭》,孙应祥:《严复年谱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14、147页。
- [8][9][11][16][22][23][25][27][28][29][30][32][36][38][39][40][41][42][44][46][47][48][49][52][54][55][56][57][62][63][64][65][66][68][69][70][71][73][75][77][78][81]《严复全集》第八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14年,第20、40、155、406、21、13、13、126、100、97、95—100、435、137、188、171、170、155、170、140、435、438、438、475、476、461、481—482、554、556、557、569、484、170、115、405—406、531、315、501、299、292、303、338、410、282、434、336页。
- [10][14][奥]阿德勒:《自卑与超越》,黄光国译,作家出版社,1986年,第46、47页。
- [12][日]关计夫:《自卑心理浅析》,杨重建、许友群译,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8年,第7页。
- [13][45][82]《严复全集》第七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14年,第520、520、520页。
- [17][19][60]陈宝琛:《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》,《严复集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541、1541、1542页。
- [18]史春林:《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证》,《福建论坛》2006年第3期。
- [20][76]王遽常:《严几道年谱》,商务印书馆,1936年,第10、99页。
- [21]辛红光:《严复与袁世凯关系探微》,《史学月刊》2008年第5期。
- [24]姜鸣:《龙旗飘扬的舰队——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》,三联书店,2002年,第278页。
- [31]王宪明:《解读辟韩——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9年第4期。
- [33]《严复集》第二册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421页。
- [34]《严复集》第五册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561页。
- [35][日]内藤虎次郎:《燕山楚水》,吴卫峰译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30页。内藤虎次郎于1899年9月15日在天津宴请严复与王修植。
- [50]五篇文章分别为:《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》(1905)、《癸丑堂主人答于君书后书》(1905)、《答某报驳议》(1905)、《答某报本月初二日驳议》(1905)、《再答某报本月初六日驳议》(1905)。参见孙应祥:《严复年谱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232—256页;《严复全集》第七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14年,第148—166页。
- [51]参见孙应祥:《严复年谱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257—296页;《严复全集》第七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14年,第187—287页。
- [53]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1—23:《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》,第1201页。
- [58][67]孙应祥:《严复年谱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357—358、387页。
- [59]《郑孝胥日记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1134页。
- [61]陶菊隐:《筹安会六君子传》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115页。
- [72]马勇:《严复晚年思想演变之重估》,《哲学研究》1992年第4期。
- [74][德]康德:《实践理性批判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109页。
- [79]严复:《与熊季廉书》,《严复全集》第八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14年,第170页。
- [80]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六,中华书局点校本。

[责任编辑:陶婷婷]